

不平凡的時代

大時代中的小人物

毫無疑問的，中華民族有它多采多姿和光榮偉大的過去，不僅是它雄踞東亞大陸，繁衍綿綿，歷史悠久；而且在那悠久的歷史中，它替人類社會提供了寶貴的生活經驗，孕育了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 and 聖君賢相、英雄豪傑一類的人物，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物典章，和良好的哲學思想體系，都對人世具有深遠的影響。其造福當時和後代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正如任何事物所具有的雙重通性，中華民族的歷史，有光明璀璨的一面，也有其晦暗惡濁的一面。其間點綴著暴君庸相、宵小流氓，甚至漢奸國賊之類的人物。其為害當時社稷，和遺羞後代的罪孽，也是罄竹難書的。這種歷史上明暗善惡的事實，和其功過是非，應褒應貶，是史家和社會學者研究批評的對象和責任，非本書的重點。筆者寫作本書的動機和目的，祇在描寫個人青少年時期所遭逢的時代背景，以及在什麼一種大環境下，克難圖強，掙扎奮鬥，倖生至今的一個小小片段，就好像是歷史影劇中的一個特寫鏡頭而已。

與其他傳記作者不同，筆者對國家社會並無赫赫之功可資自詡，也沒有多采多姿的生活軼事可供描繪

，但筆者生爲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處於民族歷史上一個不平凡的時代，所受的苦難和折磨實非盡人可比，不無記述價值。因爲個人的遭遇和處境，與國家民族的遭遇和處境是息息相關的。儘管個人事業成就平凡，在民族歷史洪流中的地位和影響也極爲渺小，可能還比不上長江裏的一個泡沫，黃河裏的一粒泥沙，但其爲構成份子之一的關係和主觀感覺或心態，是不因份量之有無和大小而失其意義的。這也不是第三者的客觀價值或看法而能改變其意義的，更不能因爲個人的渺小而忽視時代的偉大。故本書之作，與其說是要將平凡的個人搬上不平凡的時代銀幕，不如說是欲藉個人的渺小而反映出時代的偉大。

美國政黨政治史上曾有一種說法，謂美國政治和社會的改革和進步，得力於小政黨和小人物之處，要多於大政黨和大人物。初聽覺得很不合理，經過長期的觀察和研究後，才發現是有道理的。因爲，通常社會上一些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現象，多是有利於保守主義者（或既得利益者）的，一個已在社會上建立了地位的大人物或大的政黨，其本身便是既得利益者，其立場很少是不保守的；對社會的改革，便也患得患失，顧慮多端，唯恐有損其本身利益和形象，失去選票和地位。結果，它的政綱政策和行爲主張，多傾向於粗枝大葉，模稜兩可，高深莫測。蓋如此始可達到既不樹敵，又可左右逢源的目的。不若小人物和小的黨派，自感不適或路見不平，即可咆哮怒吼，無懼於形象的受損，更無既得利益或權位可失。證諸美國歷史演變過程中許多社會改革法案，如男女平等、種族同權、反對童工、反對工商壟斷、限制飲酒、所得稅法及社會福利法案等等，無一不是先由小黨小人物冒大不韙地發難提出，漸成聲勢和時潮之後，大黨大人物

才不得不順應潮流，捷足後登，據爲己有，功垂史冊。

時難年荒生不逢辰

筆者讀他人傳記時也常有類似的感覺，即一般所謂「名人」或「大人物」的傳記，尤其是「名人」或「大人物」的自傳，多是只描寫或誇大其成功光輝的一面，而隱藏其醜惡失敗的一面。這正是我國「隱惡揚善」傳統美德的一面，作爲個人操守，本是無可厚非；但作爲歷史學術研究，則頗有糾正的必要。因爲事實上，天下「完人」是極少的，光是隱惡揚善便難見人事的全貌，只是管中窺豹。這還會造成一種不切實際的文化社會傳統和人心觀念，有時會有害無益的。譬如，所謂「法古今完人」，人人以聖賢自期，但聖賢水準高不可攀，加以個人所處環境和時代不同，價值和衡量標準不一，強人模仿，或作繭自縛，結果不是東施效顰，文過飾非，便是矯揉做作，自欺欺人，演變成爲一種浮誇虛假，或華而不實的風氣。這可說是我國傳統文風和史學的一大缺陷。他國史家和傳記作者雖比較客觀實在，但亦不能全免。筆者今擬以小人物的心情，寫大時代的演變，不敢誇張渲染，不擬隱惡揚善，但願能真實地寫出所見所聞，道出良知的判斷和感覺，反應出一點時代環境的真象，以供識者品評，並藉機自省自反，如能有助史家對個人所經歷的時空有所發現，則喜出望外矣！

現在，這個偉大時代的激流衝擊還沒有過去，整個中華民族，甚至整個世界，都好像是一葉扁舟，在

這激流中浮沉起伏，驚險百倍。作爲這舟上乘客的我們，恐怕都沒有李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那種詩情畫意的輕鬆情調吧！因爲我們正處於這澎湃激流的高潮中，灘多水險，前路崎嶇。然而由於中華民族久經憂患，數千年來，遭逢的災難挫折和激流險灘實在是太多了，既已克服了過去的災難驚險，而獨立自存，生生不息，我們有理由相信，當今和未來的苦難也將會被克服，甚至成就將會更大。

家庭背景出生環境

我是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十五日，實係陰曆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生的。這個時代可說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那時，君主專制已被推翻，民國成立已經進入了第十七個年頭。然而，不但民主政治的種子沒有萌芽，甚至連剛播下去的種子都被醜惡而饑餓的烏鴉、麻雀啄食光了。先是袁世凱的帝制自爲，隨着便是糾纏不清的軍閥混戰，社會上封建餘毒猶存，地方上土豪劣紳稱霸，秩序大亂，正義全無。而外侮頻仍，鷹瞵虎視；國因民窮，國幾不成國。有志之士，各宗一說，以救國救民。理論哲學不同，方法目標不一，見仁見智，是非難明，政治上雖仍以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國民黨爲主流，然國民黨於袁世凱稱帝時受到嚴重挫折後，爲擴大羣衆基礎，進行所謂第二次革命，於孫中山先生逝世前，曾採取聯俄容共政策，造成國民黨與共產黨第一次合作的聯合陣線。此一聯合陣線因彼此立場哲學基礎和革

命作法不同，未幾即生摩擦，而於孫先生逝世後正式分裂。分裂後中共份子的活動由表面而轉入地下，由組織宣傳而游擊暴動。我的故鄉湖南，也許是因為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也是湖南人的關係，便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對象和根據地之一。

中共那時在內地的羣衆基礎是農民，湖南是中國的穀倉，也是所謂魚米之鄉，土地肥沃，水利豐富，宜於農作，農民特多，且勤勞儉樸，蔚爲風氣，中共選擇湖南下手，除上述毛某個人因素外，湖南的天時地利，也是吸引中共的原因。

從我出生以後到我十六歲從軍背井離鄉所見到的湖南農村生活，還是很原始的。人力和獸力，依舊是主要能源；江河土地，依舊是主要財源；天時，依舊是人民生活的指望，換句話說，仍舊是「靠天吃飯」。如逢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全，也就是以勤勞的人力在土地上從事莊稼，上天濟以風調雨順，無天災人禍，人民不但可以生活無虞，不愁衣食，而且可以十足地過得很舒服快樂，真有如古詩所形容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他們自食其力，崇法務實，完糧納賦，無求於國家政府，也不管是誰當權執政。天高皇帝遠，只要沒有猛於虎的「苛政」出現，他們是安貧樂道的。所以政治或國家觀念，對一般人民來說，都是十分薄弱的。然而，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社會制度和農村經濟制度，主要是土地分配所有權與佃農制度，却造成了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身無立錐」、「耕者無田」、「地主豪奪」。豐年莊稼好時，佃農尚可豐衣足食，儘管地主巧取豪奪，也能相安無事；若逢凶年，水

旱天災，收成欠佳。完糧納租後，所餘無幾，溫飽堪虞，則不免造成社會動亂，或農民革命。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演變大多是起源於這種農民革命的。

民國以來，領導革命的國民黨瞭解這種農村土地問題的嚴重性。根據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原則，也曾提出過許多合理的方案，但都遭遇到黨內黨外地主資本家的阻力而不克有效實行，使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但沒有改善，且由於內憂（如軍閥混戰）外患（如日俄侵華），使原已顯露不安的社會和人心，益形混亂。中共師承馬克斯的共產理論，受蘇俄布爾雪維克革命的影響，一心一意要以蘇俄的模式改造中國社會，也就是說要赤化中國。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時，才不過十幾個沒沒無聞的「有志之士」，到我出生的前夕已經在國內許多地方擾得雞犬不寧，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所謂「農民協會」，反抗完糧納租，然後以它爲基礎，建立地方政府，進而擴展地盤，達到奪取全國政權的目的。

我出生於我家在遭受「農民協會」清算鬥爭的浩劫以後，還沒有恢復元氣和正常生活的時候。我從沒有以歷史的眼光去研究過這一樁家庭的災難，只是幼年斷斷續續從祖父母和父母口說的故事中得知些許慘況。後來成年進學校後，才從歷史書上得到較深的瞭解和印證。那不單是我一家的悲劇，也是整個國家社會的悲劇。但這悲劇與後來中共取得政權後的歷次整肅運動，如「三反」「五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比較起來，則又是小巫見大巫了。「農民協會」鬥爭我家的對象是我的祖父銜生公，他的罪名是「土豪劣紳」。正如我在前面曾經提到，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專制王朝，只做到了民族革命——驅除韃虜，並沒有完成政治和社會革命，「社會上封建餘毒猶存，地方上土豪劣紳稱霸」，都是事實。那本是中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社會病態，並不是民國以來新發生的現象，也是自由農業經濟社會下的產物。一個人或一個家族擁有某一社區的土地所有權，成爲地主，把土地租賃給農民耕種，莊稼成熟時，向佃家按照租約收取產物的幾分之幾，只要租約合情合理合法，原來也沒有什麼值得非議的地方。卽令今日西方國家，包括美國，也都是如此作法。中國近百年農村所發生的毛病，不是該不該有地主和佃戶的制度；而是國家權威的不存在，加上人口膨脹，靠天吃飯；農業技術的進步，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速率，出產量不够供給人民食用，加上天災人禍，社會動亂，國家政府的危機便立刻發生。而天高皇帝遠，而且皇帝和他的臣相們根本不管事，也拿不出辦法來，自然更沒有建立客觀獨立的司法制度，來從事排難解紛的工作。一切原應由國家政府設定維持社會正義公平的律法規程，不是徒託空文，便是任由各地方的「讀書人」或「地主鄉紳」去解釋或自訂。只要老百姓完糧納賦，不鬧事，不造反，朝廷官署都是採取「無爲而治」，一任老百姓「自生自滅」的態度。而地方上的一批地主鄉紳之流，品格自有良莠不齊，器量大小不一。

社會不平和動亂不止

任何糾葛，一牽涉到他們本身的利益，講公平正義或具有同情心的人，還會憑良心把他們自己（多半是地主）與佃農間的關係，處理得公平合理，利害與共，彼此無怨無歎，相安無事。其具有博愛和同情貧弱精神的一些地主鄉紳，更會把佃戶看若家人親屬，互助互濟，其關係自更能和諧親切。然器量狹小、貪心不饜者，則不免巧取豪奪，利用權勢，欺凌貧弱。自然是花樣百出，無庸贅述。這種現象，如果沒有公平客觀的司法審判制度予以權衡劃一，不但容易發生偏差，而且會造成弱肉強食的社會。因為人類基本上都是自私自利，甚至是巧取豪奪的動物。國家政府的功用便是要在管、教、養、衛各方面替人民服務。而最笨本的工作是要設立制度，明刑弼教，防止個人野心和利害的衝突；除暴安良，維持社會公平正義。否則，便與森林中的野獸社會無異，必然造成強凌弱，衆暴寡，天下大亂的局面。

一個國家的政府一旦失去了維持公平正義的功能，社會人心「望治」「求安」的本能，便會驅使人民走向「革命」「造反」的道路，以期再造環境，達到安居樂業的目的。人類歷史上不知已經過了多少這種變化，而且是循環不息的。因為，人類的慾望無窮，任何國家政府的典章制度、方案政策，都不可能滿足所有人民的一切慾望和需求。是以人類有史以來，便有各式各樣的哲學、理論、思想出現，不斷實驗、變換，以期改善，但至今還沒有一種制度够稱爲十全十美。不過依筆者個人研究、觀察和經驗，在政治方面，還是「民主」和「代議制度」下的真正「共和」體制，比較適合今日民智已開的社會。然而，實施民主，需要許多條件，也不是一蹴可幾的。

前已提到，國民黨的革命在推翻滿清專制的種族和有限的政治革命方面有了功不可沒的成就。但在消除封建餘毒，和改造經濟社會秩序方面，則在民生主義還沒有起步前便遭遇了阻礙或挑釁。以致在「軍政」方面正所向披靡，收拾了各地割據的軍閥，朝統一中國的方向急速前進時，「訓政」還來不及有效開始，便受到了蘇俄革命的影響。共產思想傳入我國，一時在知識份子中引起了猛烈的衝擊。初試有成的國民革命美好藍圖上，這時好像被潑了一盆濃臭的污水。不但使一般人不知所從，即令國民黨本身的領導階層和羣衆，也感到徬徨失措，陷入分裂，加上後來的外患頻仍，使原定由「軍政」而「訓政」、「憲政」的建國程序，無法順利推進實行。這實在是中國人民最大的不幸，於今半個世紀已經過去，各種主要的革命救國主義、思想、方案都經過了一番實驗，中國人民爲此所付出的代價——包括生命、財產、精神、勞力和血淚，也實在是太大了。正確的答案也已經從海峽兩岸的成敗事實中找出來了，那便是要回到孫中山先生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老路，才能使中國近代化，使中國人民能與其他先進國家的人民一樣，享受一點「人」的生活。

民主潮流風起雲湧

在使中國重返孫文主張的老路時，我們自然不希望再有循「軍政」達到統一全國的必要，我相信除了大陸上一小撮喜歡殺人的無知共黨軍閥，戀棧不願放棄權位的落伍政客外，不會有任何人主張中國的統一

應再經過一次血的洗禮，和核子武器破壞。人民的知識水準已非五十年前可比，我們要統一，我們要和乎統一，我們要統一在久經考驗、世所共見、救國有效、實驗有成的三民主義，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基礎上。我們甚至連「訓政」的階段都可免除，因為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國家分治的局面所經驗的教訓，已使每一個中國人都瞭解到「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意義和重要。

中國大陸風起雲湧的民主潮流，以及大陸同胞到海外後投奔臺灣的熱潮，和現正在新大陸激流澎湃的「中國之春」和「民主統一」運動，已說明了一切，已說明了任何專制暴政，再也壓抑不了中國人民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行動。所以我要對中共提出忠告，最好早日把政權交還人民，把國家交還人民自己來治理，你們已統治了中國大陸三十多年，但是你們的理論和政策都證明失敗了，為何還要霸佔着國家的公器，繼續讓人民受罪呢？我們已聽够了你們的甜言蜜語，我們再也不會相信你們的宣傳了。「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還有什麼可爭辯的呢！為何不識時務和頑固至此，非要等到全民革命爆發才罷休呢！今日是一個理性的時代，我們要「冷靜」地講道理，不能再憑過去那種煽動、欺騙或殺頭威脅來解決問題了。你們都自稱是革命英雄，是出生入死的好漢，是救國救民的志士，難道不知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道理嗎？人民實在已忍無可忍了，「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要同歸於盡嗎？那有什麼好呢？為何不學學民主先進國家當政者的風度和胸襟，讓政權在公平合理、愉快和平的氣氛下轉移。讓我們從「憲政」開始，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吧。

祖父受難幾遭不測

現在話說回頭，家祖父被中共和農民協會鬥爭的背景略如前述，他們指他是「土豪劣紳」，無法無天地把他抓押，帶着高帽子遊街，受盡凌辱不够，還隨意定罪，並判處死刑。（註：見毛澤東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十四大成就，第二項被清算的人中，家祖父即爲益陽縣二人之一。）幸而在死刑還沒有來得及執行時，反共的勢力重光故土，是謂「反正」，祖父倖免於難，我家才有以後的欣榮發展。我的祖父是不是真正的「土豪劣紳」呢？按照社會正義的平衡原則，甚至從革命的立場來看，是不是應該受這種懲罰呢？我現在客觀地以政治學術或革命歷史的眼光來看，答案都是否定的。他只不過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讀書人，在清末科舉制度下考取秀才後，即逢民國誕生，雖未在新的學制下繼續深造，但仍自修不輟，其對國學涉獵造詣之深，和詩文寫作之功，據個人客觀評校，其水準實不低於時下一般大學國文教師。在當時民智尚未十分開發的農村社會，像我祖父那種飽學之士，會很自然地成爲衆望所歸的中堅或領導人物。雖然他終生以耕讀持家，未涉仕途，也沒有取得什麼功名，但鄉社宗廟之間，他是領袖；鄉人戚友中的糾紛訴訟，都是找他，而不去法庭。他常有一語息爭，一言九鼎的影響力。這自然會不可避免地引起野心份子的嫉妒，甚至爲流氓地痞所仇恨敵視。當農民協會在中共領導下喊出「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地方惡霸」、「打倒當權派」時，一些平日好吃懶做的人都脫穎而出，一哄而上，成了農民協會的主幹，和中共

的羣衆。當時還沒有像後來「文化大革命」時所用的一些用以扼殺異己的新名詞，如「走資派」、「反黨份子」、「黑五類」、「臭老九」、「工賊」、「漢奸」……等等。只有一個籠統的罪名——「土豪劣紳」。如前所說：筆者同意在中國傳統農村社會中，許多地方有所謂「土豪劣紳」，甚至「地方惡霸」。他們或則自成勢力，或則狐假虎威，仗勢欺人，作威作福，魚肉貧弱。但那似乎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避免的情形。如在美國社會，便有所謂滅非（Mafia），和政治老闆（Political Boss），那才真是惡霸，或地頭蛇呢！從任何尺度來衡量，我的祖父絕對不够資格被加以「土豪劣紳」、「惡霸」、「地頭蛇」或「滅非」的榮銜，他不但沒有那種條件，也沒有那種能力，更沒有那種心願。首先，他在本地擁有的土地財產非常有限，約莫一、二十畝水田，和一所僅優於竹籬茅舍的瓦屋。在外縣沅江，洞庭湖邊約莫還有百餘畝地，每年收租運回的魚米也僅够全家餬口而已，這算得是「土豪」嗎？這算得應受清算的「資產階級」嗎？其次，他不但不是「劣紳」，而實在是「賢士」，他滿腹孔孟之道，不但以耕讀自娛，教育子孫，同時還與學開教，濟弱扶貧，修橋鋪路，造福鄉里。他更不是「惡霸」，而是與人爲善的「正人君子」。他最不願開罪他人，最怕引起誤會，但他個性倔強，嫉惡如仇。他以「浩然堂」爲其莊名，喻善養其浩然之氣。平時爲主持正義，自難免樹敵，他有強烈忍辱負重，和「打落牙齒和血吞」的精神。與當時本縣本鄉許多田連阡陌，平日作威作福的真正「土豪劣紳」，真不可相比。然而那些人多是不學有術，長袖善舞，知道見風轉舵，不但當年農民協會造亂時期沒有遭殃，後來中共取得政權後，也沒有被清算鬥爭，有的反

而搖身一變成了新貴。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也是中共革命的一種諷刺。因之我常常認為，中共的「革命」，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場權力的鬥爭罷了，一旦獲得政權，跟它的鷄犬都變成了特權階級，其敗壞和禍國殃民的程度，實使歷史上所有的暴君庸相和苛政都黯然失色，望塵莫及，不僅是「秦皇漢武，略輸文采」而已。（註：引毛詞原句）

父親教書也難安身

我的父親更是一個性情謙和的好好先生，從湖南長沙嶽麓山的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一直在本縣和鄰縣學府執教，國學根底深厚。書法和寫作天才都屬上乘。我從小學到初中畢業後投筆從軍，都是追隨在他的左右求學，耳濡目染，受益良深。他沒有任何野心和宏志，但求教學相長，平安度日。他關心政治，但除非必要，很少參與政治活動。他安貧樂道，生活簡單。他常以「大智若愚」、「大器晚成」一類的思想勉勵我，他自己雖無宏志，但對子弟們則寄以厚望，可能是他認為自己身為長子對家庭責任重大，不能遠走高飛去創造事業的緣故吧！

他同時代一些物質環境比他好，真正出身「土豪劣紳」家庭的人，後來都是左右逢源，飛黃騰達。不但在國民黨內這種人很多，共產黨內也不少。舉個例來說，曾經在中共政權紅極一時，主管文教宣傳的周揚（起應），便是我縣新市渡人，與我祖母娘家同宗，且有瓜葛之親，與我父親曾在同一所學校教過書，

他的家庭便較我們富有。然而後來他竟成了要以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共王朝的重要領導人，而真正產業有限，以現今價值衡量，甚至可說是無產階級的我祖父和父親，反受到中共的清算鬥爭，無辜地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和諷刺嗎！後來讀毛澤東傳記，發現他在湖南湘潭的房舍田地也比我祖父多。許多其他中共領導人物也是出身地主富農，甚至資本家階級成份家庭，其人數比例之高，較國民黨也不會遜色。當他們當權後，其貪圖享受、濫用特權的情形，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可從文革後中共官方文件中見之。哀哉！此之謂「革命」乎，實猶不比改朝換代也。蓋新的朝代開始時，朝廷例皆大赦大放，與民更始，那會清算鬥爭，追尋三代，永無休止呢！

反正後的故鄉，社會秩序仍舊不安定，顯露出許多潛在的危機。爲策安全，脫險出獄後的祖父，與正在教書的父親商議決定「遷地爲良」。把一家大小，從發跡的千家洲搬到數十里外的太平橋，以觀變化，並閉門自省。我便是在太平橋出生的，是我家在避難時期新添的唯一一人丁，也可以說是家中的難嬰。

據母親說，我早產了幾個星期。這自然與家難有關，因爲兵荒馬亂，社會動亂，政治鬥爭，加上地方上的各種惡勢力橫行霸道，除了祖父被農民協會百般迫害，死裏逃生外；剛出社會不久，正在教書的父親，也被牽連着一些無謂的煩惱，也可以說是嚴重的危機。緣我父親頗有文才，一手趙松雪（孟頫）的行書寫得十分體面。這在當時一些軍閥，地方惡霸，甚至綠林豪傑的眼中，都是爭取作爲祕書或師爺之類的好對象。事實上，家父也曾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曾圖參加國民革命行列，投効過由本縣軍人，保定軍校出身

的龔浩（孟希）介紹（按：龔氏數年前才在臺去世）的國民革命軍某單位的幕府（已忘其名），充當少校秘書，但不到幾個月，不知是甚麼原因，也許被北軍打垮了吧，該單位瓦解，父親便從長沙回到老家教書，且漸具名氣。這時，本縣有一個辦團防起家的地方惡霸，也是我曹氏本家的熟人名曹明陣，招兵買馬，編練了好幾千人，以保護地方治安爲名，盤據山區（我邑有雪峯山，奇峯挺拔，形勢險要，常爲綠林集結之處），他私設關卡，收捐抽稅，以土皇帝自居（這現象爲我國歷史上的政治常態，全國各地，都是在那種大大小小的軍人惡霸、土匪割據之下，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地方政府懦弱無能，寄生於這些土皇帝的頤指之下。到抗戰時期和以後，因抗日軍隊國家化的需要，這些土軍或則解散、或則改編、或則被國軍剿滅。此曹明陣糾合的幾千人，便是於抗戰後期，因其違抗政府命令，拒絕收編，且襲擊過路國軍，搶劫槍械以擴充勢力，激怒了戰區司令，派大軍圍剿，擒獲曹氏，予以軍法審判後被槍斃正法的。）他自然也希望充實他的幕僚，提高他出佈告、下命令、寫八行的文字水準。知道我父親回鄉後，便不只一次地到他執教的龍洲師範學校找他入幕。這從曹明陣本人來說，是瞧得起我父親，予以垂青。但從我受過高等教育的父親來說，自然恥與爲伍，不能接受。於是推推拖拖地沒有應命。這簡直是有眼不識泰山，置曹明陣於何地？這種殺人不見血的綠林人物，在受到我父親的冷落後，認爲關係到他在地方的威嚴聲譽，是可忍，孰不可忍。爲除後患，便要派兵抓我父親，且公然地揚言要除之而後快。一介書生，手無寸鐵的父親，不但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講不清」。在當時那種無法無天的原始社會中，爲了保命，只有開溜逃命一途

這也是我家從千家洲遷居太平橋的另一原因。父親帶着大哥，逃到洞庭湖邊的華容縣去教書，把其他家眷交隨祖父躲藏到太平橋去了。你想，在這種情形下，懷了孕的母親，不但沒有今日孕婦們的醫護享受，而且天天要爲柴米油鹽着慌，同時經常生活在恐怖之中，我的早產，是可以想像的。

安定進步人人嚮往

北伐成功以後，國民黨政權在長江流域有重振乾坤之勢，我縣社會亦因「反正」而漸趨安定。共產運動被局限於江西瑞金一帶，地方流氓土匪也漸被人民唾棄而逃匿山區，如曹明陣之流便率部回雪峯山匪區去了，到抗戰軍興，又圖擴充勢力而被國軍剿滅，已如前述。

三〇年代開始，國家呈現著一股中興氣象，中共在江西的老窩，被中央軍圍剿後西竄延安，是他們所謂的「長征」，事實上只是「長逃」而已。國民黨在蔣介石將軍領導下，整軍經武，加強國防，提倡新生活運動，嚴禁煙賭，改造社會陋習，推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裕民生，開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創局。我雖在襁褓孩提時期，但仍依稀記得，不但自家的生活大見改善，社會環境也日見進步，人民都能安居樂業，趨向安定繁榮。這時，我父親才敢再度還鄉，公開露面。一面參與新的政治，出任縣議員；一面受聘在縣立女子中學執教。數十年後，我在紐約叔執朱光澤、蕭莊梅賢夫婦家作客時，遇到一位前在我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服務過的一位將軍夫人，據她說她曾是我父親在該校的學生，這位夫人曾生育六、七位女兒，個

個美麗動人，曾享譽一時，算是亂世中的巧遇。他還有一位後來相夫教子，卓有成就的傑出學生，現在西雅圖的凌遇選夫人，文思榮女士，多年來經常通候，但迄無機會識聆教爲憾。我家這時也由太平橋遷回千家洲故里。另在益陽縣城購屋，由我父母兄弟居住，以便利父親在縣城教書工作。

面臨著一個這樣欣欣向榮的大環境，毫無疑問地，也是極自然的，祖父和父親都對國民黨的統治寄予殷切的希望。他們必信，也是我今日身爲一個美國大學政治歷史學教授所深信不疑的，任何社會，必先有「安定」，才會有進步。只要社會安定，以中國人的勤勞節儉的美德，和創造發明的智慧，便很快可以消除「貧」、「病」、「愚」、「私」，使國家社會趨於現代化，使人民生活水準，向先進現代化的國家人民看齊。由於受到中共發動的農民協會迫害的慘怖經驗，加以他們深厚的儒家背景，祖父和父親都很自然地憧憬著這種「安定中求進步」的環境能够繼續長久，永不願見暴力革命，重臨故土；地方惡霸，再顯淫威。

在這種思想和願望驅使下，不但他們自身在個人的崗位上安份自勉；在教育子孫上，也希望他們將來能投身於這一偉大時代的洪流，受到良好的教育，從事「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偉大事業，成爲光宗耀祖、源遠流芳的一代。我乳名「頌平」，便是祖父取的，即寓有「歌頌和平」、「頌禱太平」之意。也可顯示當時我祖父和父親對時世的一種心態。